

# 第一章

## 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屏障

“安全”，一个人类永恒的话题，一个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安全”。于是，“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概念应运而生。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不重视其“国家安全”，并以此为终极目标。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是国家的命运，是国家统治的基础”。

尽管不同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处于不同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地位的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目标有不同的追求，但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将保护本国安全作为其首要职责。

国家安全有着极为宽泛的内涵。诸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众多安全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是以军事安全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条件的。

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整体屏障。

## 1. 国家安全新概念

1997年4月22~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两国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4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个引人注目的协定“是一个意义非比寻常的创举”：它不仅有利于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而且为“冷战”后的世界提供了一个迥然有别于“冷战思维”的新的安全模式。

的确，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带来了国际关系体系“整体性、深层次震撼的变革”，即整个国家社会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种剧烈的变动，必定会带来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

人们不会忘记，在“冷战”时期，由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对抗，扩展为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它们之间竞相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竭力争夺势力范围，结果险些将世界送上核大战的边缘。这一时期的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将己方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上”。那时的国家安全观所关注的焦点，一是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外来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二是主权国家如何防止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经济上的封锁、制裁和掠夺。

“冷战”结束以后，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经济和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人口、环境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虽然笼罩在人类头上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核大战的阴云已经散去，但局部的武装冲突和区域性的战争依然不断，世界敏感地区的“冲突热点”仍然存在，引发战争危机的“因素难题”尚未解决。即如1998年上半年，伊拉克核查危机尚未

结束，印度又将“核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制造了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核恐怖，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在世纪之末的1999年新年伊始，“沙漠之狐”尚未遁去，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又点燃了巴尔干地区的“火药桶”，引发了一场更大范围的危机。

如此“缤纷多彩的世界，多种多样的问题”，伴随着探索建立“冷战”后以及跨世纪的地区和全球新秩序的进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冷战”时期更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更新的含义和更广泛的内容”。

那么，在如今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以及全球事务中“经济因素”日益突出、促进发展成为主流的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具有哪些特殊内涵？

近年来，各国就此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最后均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安全保障”这一答案上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冷战”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基本目标是，“在调整与变革进程中保持国内稳定以利于经济与社会持续、全面发展，在世界格局和安全秩序发生巨大变化与重组过程中消除紧张、避免对抗、确保国际环境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基于这种认识，“增强国防力量、进行安全问题多边磋商、谈判以缓解紧张局势，平息对抗危机，已成为‘冷战’后世界多数国家与追求经济发展相并列的同等重要目标”。

本着这一思想形成的国际安全关系新框架，无疑也就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在设定国家安全构想的同时，开始将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纳入其中；在确保‘生存安全’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考虑‘发展安全’在思量‘军事安全’保障的同时开始将政

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纳入新的安全考虑之中”。

正因为如此，当今的国家安全概念日益泛化，安全意识与安全概念从政治、军事领域逐步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等领域。安全概念和政策的指向，从过去着重确认和主要对付来自外部的威胁，延伸到关注国内的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生活、本国文化价值体系方向调整。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长期以来的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核扩散、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电脑“黑客”、跨国犯罪、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内战和民族、宗教冲突等都成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也就更加宽泛。它除了“冷战”时期考虑较多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之外，还包括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与国家安全”、“国内动乱与国家安全”等这些新的安全领域的内容。与此相应，就出现了一些涉及分析与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提法，诸如“综合安全”、“大安全”、“总体安全”、“国家安全综合保障战略”等，使国家安全问题“日趋具体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对此，西方一些国家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相区别。

也就是说，当代国家安全观念具有综合性更强、内容更加全面的特点。具体体现在：

一是提倡“综合安全”。“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概念“已不局限于军事或情报领域和范围”，或者说“已不属于一国军事或情报等其他单一领域内的特定概念”，而是包容了一国政治、经济、金融、资源、科技、信息、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而且彼此关联、相互渗透

和相互影响。换言之，当今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已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因而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和用综合的方法消除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与未来的威胁”。

二是要求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必须贯彻“多边化”的原则。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生活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国家安全也越来越趋向国际化。也就是说，在开放的环境下，一方面，一国的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到国内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安全问题’和影响；另一方面，一国的发展与稳定既受制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将是今后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化趋势。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的任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依靠更多的相关国家在“不同层次、采取不同渠道来解决或维系”。

三是强调“合作安全”。随着国际生活一体化的发展，“冷战”时代那种彼此对立、各自为阵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代之以更多地带有“妥协”和“合作”色彩的新型国际安全竞争模式。如今大国关系中出现的“伙伴关系”便是这种新模式的产物。因此，“加强谈判对话，扩大安全合作”便成为各国调整和构筑稳定可信的安全关系与国际安全，确保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各国之间的‘进攻性’的安全竞争正在更多地为‘防御性’的安全竞争所取代，建立信任而不是加剧猜疑，寻求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对别国的军事优势以扩张本国的安全利益，加强和扩大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和遏制，防止战争发生而不是赢得战争”，将成为各国处理安全事务的基本原则。

到这里，新的安全观所包容的时代内涵已基本明朗了。李庆

功、韦伟在 1997 年 12 月 24 日的《解放军报》上以《世界需要新安全观》为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从政治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国家的政体和制度不能由他国来改变，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有国家 无论大小、贫富、强弱 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允许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颐指气使，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新安全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容损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经济制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应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不允许把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作为一张“牌”对他国进行施压，干扰他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竞争应按照国际法准则和规划来进行，出现经济矛盾、磨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但必须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与谈判来解决。

从科技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因此，应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不能以科技转让作为对他国施压的工具；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安全为宗旨，而决不应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的，更不能利用高科技武器挑起战端。

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新安全观要求：军事力量负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使命。因此，加强军队建设、发展武器装备、改革军事机构是必需的；各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应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各国军事力量应在更宽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如打击恐怖主义、走私贩毒、遂行抢险救灾、人道援助等。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也不允许推行军事干涉主义，不能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各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军火贸易应以“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

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新的安全观要求：严格控制人口，以减缓对人类共同财富的消耗；着力保护资源，以延长地球和人类的生命极限；根治环境污染，力求使人类拥有一块永久生存的净土。处理好这类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要靠各国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互相合作。

由此可见，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通过磋商、协调、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它是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基本依据，也是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重要基石之一。

这段话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冷战”后新的安全概念的特定内涵，即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国家安全问题还是国际安全问题，都将“比以往更多地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国际地位等问题”。而欲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又离不开“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合作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体安全”这些新的举措。

随着新安全观的建立和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的安全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它不仅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建立。在这种形势下，也就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安全新模式。

——国际维和模式。这是“冷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模式之一，不仅参加国家多，而且实施力度强，已成为当今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障措施。但由于某些大国试图控制和干扰国际维和活动，甚至使用武力进行“强制和平”、“缔造和平”，致使国际维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安全对话模式。这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主要模式之一。进行双边的和多边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定期的和不定期的、预防性的和应急性的安全对话与磋商，进行立场性、政策性、战略性的安全协调，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安全合作，对预防危机发生、遏止冲突升级将发挥重要作用。

——安全协定模式。这是近两年凸显其功效的新型模式之一。1997年的中、俄、哈、吉、塔五国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就是这一模式的两个杰作，开创了通过这一模式确保周边安全的先河。

概言之，于大国关系调整中初步显现出的新安全观，是对笼罩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思维”的否定，它作为一种反省历史、顺应潮流的理性选择，必将对我们构筑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当前两种安全观并存的条件下，“尽管新思想、新观念远不如传统力量强大，但是有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阳光雨露的滋润，相信新的安全观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导思想只是迟早的事”。

## 2. 国家安全呼唤军事安全

随着世界形势的飞速变化，尽管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面目全非”，但人们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争充斥世界的人类文明中，“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它独领风骚，支配国家政治生活几千年”。

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使国家确保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最高价值所在。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全目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任务和追求。诸如国家的独立地位、领土的完整、民族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军事的强盛等 都可能是维护安全的内容和目标。但是，国家安全观无论如何变化，国家安全的内涵无论如何丰富，都无法从根本上取代军事安全的地位和作用。

从当今世界频繁发生的各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下个世纪的地球 绝不可能是到处“莺歌燕舞”而更多的是“狼烟”与“橄榄枝”同驻“一片蓝天下”。

近年来，经济安全更加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而成为世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说，追求经济安全本无可非议，但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却因此而忽略了军事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更有人认为随着传统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大，军事安全从此就可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不然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目前谈论得最多的是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环境生态安全等世界性问题，却冷落了军事领域的

建设和发展。

忽略军事安全的人们大概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安全必须有军事安全手段的坚强保障！

在战争因素尚还存在的条件下，国家维护安全的最重要目标还是军事目标。况且，军事因素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并不仅仅限于战争一种形式。

应该承认，当今世界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各国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的种种争斗和角逐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等诸多方面，其中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已成为对所有国家的巨大威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在《真正的世界大战》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世界各大国为了掌握新的全球经济而进行的争夺战”。

在这种形势下，今天谁也不敢说本国的安全有了绝对可靠的保障，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常常倚仗其实力耀武扬威，俨然以“国际警察”自居的美国，同样受到日本和西欧迅速发展的经济力量的严重冲击。据美国学者估计，日本人平均每天“狼吞虎咽”掉一家以上的美国公司。日本对欧洲的经济渗透，也在西欧引起了极大恐慌。英国格兰亨利管理学院的巴里·詹姆斯教授告诫说，设在欧洲的日本制造业公司的装配厂，可能成为摧毁欧洲制造业竞争力硕大的“特洛伊木马”。

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忽略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必须克服以往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多半是战争威胁”因而常常把国家与战备、与军队等同起来，视野局限于“守疆界，护版图”的狭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因此就可以忽略军事安全。

事实上，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战争就不可避免，军事斗争就还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它的特殊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替代的。

所以，有人这样评价当今世界的安全形势：“今天极少有国家需要为生存而作战，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而生存。”

这绝不是凭空而论。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国际形势却并不乐观。尽管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战争的阴影却并没有散去，相反，压向世界善良人们头上的战争阴云却越来越浓。

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当代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所以，尽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导致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小，战争的危险却并没有减少，各式各样的危机和对抗也并没有停止，军事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尽管战争手段解决利益冲突的作用有所减弱，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并没有降低。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放松军备，相反，军备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争夺却愈演愈烈。

在当今世界上，尽管各国几乎都把发展经济和科技作为增强国力的重心，但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仍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既是制约战争，特别是世界性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又随着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发展，助长一些经济强国以军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倾向。80年代以来爆发的有大国参与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诸如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

马，空袭利比亚，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 美国空袭阿富汗，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干涉；还有当年英国派特混舰队远涉重洋争夺马岛，法国对北非武装冲突的军事干预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西方各国日益重视防止高技术武器扩散，以及对付毒品走私、海盗劫掠等问题，也将促使它们继续发展军事力量。

第二，由于当代国际关系中还存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使得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得不依赖军事实力与之抗衡。在这一方面以 1998 年爆发的印巴核军备竞赛最为典型。

第三，对一些世界超级大国和经济强国来说，继续增强军事实力的负担相对较轻。如美国 1998 年国防预算为 2 676 亿美元，1999 年为 2 706 亿美元，约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量的 1/3 而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却仅占 3%；日本 1998 年国防预算达 352 亿美元，军费开支仅次于美、英居于世界第三位，但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却还不到 1%；英国 1998 年国防预算高达 372 亿美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 2.8%；法国 1998 年国防预算为 304 亿美元 德国 1999 年国防预算为 264 亿美元，其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才分别为 2.2% 和 1.2%。相反，目前世界上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的前 10 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

时刻梦想独霸天下的美国，国防开支一直是在高水平上保持低速增长，始终维持 2 600 亿美元以上，高居世界国防开支之首。1999 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克林顿又提出了一个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的建议，要求国会增加 120 亿美元的防务开支。这是自 1982 年以来防务开支增幅最大的一次。克林顿还要求，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开始的 2000 财年中，给军队提薪 4.4%。他称这是为了确保美国军队“在下个世纪仍然是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是为了“保证

美国军队继续作好充分准备，以世界最强大的作战力量，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官员补充说，克林顿这次要求增加的 120 亿美元防务开支 是计划在未来 6 年中增加 1 000 亿美元防务开支中的第一笔。

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军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亚洲地区，各国的军费开支更是大量增加，其中以日本和印度增长最快。日本军费开支在 1988 年还不到 300 亿美元，10 年后的 1998 年竟然达到 352 亿美元 净增加近 60 亿美元 实增 20%。印度 1993 年的军费开支为 63 亿美元，1998 年国防预算达到 99 亿美元 实增 57%。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强调质量建军，重点提高战略威慑能力、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正在进一步加强高技术的开发和高精尖武器的研制。由于新的军事技术，如定向能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智能武器以及外空武器的发展，有可能使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经济大国避开国际上对它们发展核力量的限制，跃过核阶段，通过发展在太空部署的智能化非核武器，具备战略威慑能力。倘若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将严重失衡，必然给整个世界军事形势带来非常复杂的局面。

由于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技术进步，许多国家已经掌握发展核武器的技术，跨入了核门槛；还有不少国家透露出想拥有核武器的意向。1998 年印、巴两国公然无视国际禁令，展开核竞赛 无疑又是对这些国家的一种“鼓舞”。高技术兵器、特别是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扩散趋势，有可能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和地区稳定的新的严重问题。

由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美国和俄罗斯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并且在全球进行程度不同的军事收缩，给一些中等

国家或地区大国带来了扩大自身政治和军事影响的机会，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力量和对外使用军事力量的倾向可能增加，从而导致一些地区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保持高水平的军费开支、大力加强军备的同时，其对军事安全的重视程度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每调整次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军事安全的地位就会上升一次，以适应其独霸世界战略图谋的需要。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组阁初时，提出的对外战略顺序依次是：经济、安全和民主，而且提出“要像激光束那样将精力对准经济”、但仅仅两年以后，其对外政策的顺序就变为“安全、经济和民主”了。军事安全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的不断上升，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保证在 21 世纪继续称霸世界 实现其充当“世界警察”的霸主梦，美国在近期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然认为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变化不定，既充满着威胁和挑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据此确定了美国在未来世纪安全战略的总目标仍然是称霸世界。

在安全、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方面，报告仍然坚持“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三大主要目标。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报告认为美国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军事实力，致力于美国外交，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稳定，“美国担当领导责任”。

为了对付各种威胁和危机，该报告强调要“保持精锐的军队”，做好各种军事行动和小规模应急行动，“最好与盟友协调一致打

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等方面的准备。新报告还第一次提出，美国要提高独自“带领”国际社会“执法的能力”以便对用非常手段袭击美国领土和美国人民的分子“绳之以法”。从这一报告里，我们不难发现，军事安全因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然位居第一。

美国不仅自己不断加强军备，把军事安全放在对外战略的首要地位，而且还授意和操纵其盟国，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军事安全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

人们还记得，1949年4月4日，当美国一手操持的北约在美苏“冷战”中“忧心忡忡”地诞生之时，还是为了防止所谓“来自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威胁”其所遵循的是“地区性遏制战略”。随着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加剧，其军事战略又发展成为“大规模报复战略”。70年代以后，在坚持“前沿防御”战略的同时，强调“努力缓和东西方关系，逐步扩大合作领域”。这时，北约的职能作用仍未超出“防御”的范畴。

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实行“融合欧洲”的战略，试图通过北约东扩和建立和平伙伴关系把中东欧全部纳入西方势力范围，建立北约为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北约的军事战略也从“前沿防御”变为“应付危机”，从而使北约的职能开始向“进攻性”转变。到了世纪之末的1999年时，北约在不断东扩之后，于其成立50周年之际，更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新概念”，公然把联盟发挥的作用扩大到集体防卫范围之外。与此同时，北约还打着“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幌子，对南联盟进行了狂轰滥炸后气势汹汹地向世人宣告：它应该而且有能力在全球维持安全秩序！

北约公然绕过联合国，利用科索沃危机作为试验“新战略概念”的场所，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充分说明它已由

一个防御性军事集团变为侵略性的军事集团。有识之士惊呼，北约军事战略从“前沿防御”到“应付危机”的这一变化是一种“危险的转变”。

出于独霸世界的战略需要，美国还将其军事安全的目标扩大到了整个世界。而其势力所及之处，军事安全的地位也就随之上升。这在亚洲表现尤为突出。

1998年岁末，美国基于对1995年以来亚太安全形势趋于严重的判断，正式发表了新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认为，亚太地区“虽然整体保持和平，但旧的威胁并未消除，新的挑战接连出现”。报告将东亚金融危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及印巴核试验对美在东亚防核扩散努力的打击等，统统视为当前美在该地区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为应付这些所谓的“新旧挑战”，营造未来于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确保自身对各地区危机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报告在强调坚持过去亚太安全战略主体框架的同时，提出了维持美在亚太地区现有军事存在、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积极介入并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对话和加大对各类新旧安全挑战的应对力度等新的主张。通观该报告，无处不体现出美试图以军事手段支持其安全战略的惯有思维。

这份报告是美国90年代以来发表的第四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也是美在世纪之交制定的跨世纪亚太安全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于是有人称之为美国“跨世界的称霸战略”。

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这一“跨世纪的称霸战略”，美国加紧了同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

1999年初，美英联手打击伊拉克的“沙漠之狐”的硝烟尚未散去，美国便重新启动了名为“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即“TMD”）的“小星球大战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今后5年内增加的1000

亿美元军费开支中 将有 66 亿美元用于“ TMD”计划 这还不包括此前已列入预算的 39 亿美元 ;日本于 1999 年度开始同美国合作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日本政府为此在 1999 年度财政预算中拨出专款 8 000 万美元 ;在台湾方面 ,针对台湾当局曾多次向美国提出购买 “宙斯盾” 防空武器系统和 “爱国者” PAC - III 型先进防空导弹的意向 ,美国国会于 1998 年底通过一项决议 ,要求国防部把台湾纳入美国的 ‘ TMD’ 系统 并着手讨论对台军售问题及台湾以何种方式参加 ‘ TMD ’ 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于 1996 年得以重新强化。这对一直梦想成为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日本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大大加快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再次抬头。

1997 年 9 月 ,美日两国又发表了 “可以称为日美迈向新世纪加强军事合作的指导方针” 的新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 为日本军事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道路 ,使日本可以借与美军合作之名 ,行扩充日本军事力量之实。

为了确保 ‘新指针’ 的贯彻实施 ,日本政府于 ‘新指针’ 公布后 ,就迫不急待地起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仅仅几个月后 ,日本政府便于 1998 年 4 月向国会递交了三项法案 :一是 《自卫队法修正案》 ;二是 《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 ;三是 《周边事态法案》。时隔一年以后 即 1999 年 4 月 ,日本国会众议院置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于不顾 ,赶在小渊首相 29 日访美之前 于 26 日匆匆忙忙地投票通过了这三项法案 ,从而使小渊首相得以给克林顿总统带去了一份丰厚的 “见面礼” 。一个月后 ,日本国会参议院也正式通过了这些法案 ,从而使日美军事合作有了法律的保障。

美国自己大概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它也不愿意这么想 ,它打着